

山西中文學術

文史述論

文史述論

姚奠中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文史述论

姚奠中 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述论/姚奠中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山右中文学术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10914 - 7

I. ①文… II. ①姚… III. ①文史哲—中国—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532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书获得

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中央财政专项支持计划;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经费支持

文 史 述 论

姚奠中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0914 - 7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张 19 3/4

定价:43.00 元

序 言

姚奠中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实践

姚奠中先生是章太炎先生最后的一位弟子，也是当代少见的博学鸿儒。他淹贯经史子集，艺精诗书画印。冯其庸先生对他的评价是：“雄才博学百年身，四海堂堂第一人！”“论学于今推独尊，章门一脉赖传存。”霍松林先生也说：“姚老奠中先生雄才博学，其人品学问书艺均为当代典范。”周汝昌先生的评价是：“姚奠中先生身为鸿儒，而通于艺者亦造上乘……非等闲可望其项背。”近日，这位大儒于山西大学家中安坐仙逝，习近平、俞正声、刘云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学术界、文化界的许多名流，先后用不同方式表示哀悼。认识与不认识而前来吊唁的人多达二千余。人们在痛惜、哀悼一代大师离去的同时，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用当代学术界普遍采取的评价指标——项目级别、课题经费、文章档次、专著数量等来考核，姚奠中先生似乎表现平平，何以当代几位泰斗级的前辈对他却有如此高的评价？何以会得到这么多人发自内心的尊崇和景仰？我们在梳理姚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实践的过程中，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百年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学术由以札记、评点、注释、考辨为主要形式的研究格局，变而为纵横驰骋的论说、演绎。由对精神内核的把握与探求，变而为对问题的学科归类与系统研究。虽说成果累累，前所未有的，然而中国学术也由此改变了原初的方向，逐渐脱离了传统以健全人格为第一要义的治学宗旨与明道救世的治学理念，而走向了以著述为能事的技术性竞争；

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成为普遍法则，中国文化的精魂在被规范中不断流失；学者以专深为能，以填补所谓空白为荣，而不知博通融贯、回真向俗。学术研究失去了为人类创造健康、快乐、幸福生活服务的原则，变成了少数人谋生、获利的手段。“学而时习”的“不亦说乎”，为论文生产的数量、质量要求带来的疲惫、焦虑所取代。学术与人格分离，学术与人生分离，学术与社会分离。著作等身，人格萎地，剽窃之风，愈演愈烈，学界英俊，接连早逝，这一幕幕现实，变成了时下的哀叹曲。然而正是在浩浩荡荡的人群于“西行”颠沛之中发出无奈的感叹时，回首发现了姚奠中先生——这位充满欢乐的百岁老人，他坚守着中国学术传统的方向，笃志进德修业，由此而成就了他的高尚人格、雄才博学与百岁之躯。千百万人“高山仰止”的感受和敬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著名学者吴相洲先生说：“姚奠中先生是中国学术正脉的守护者。”我认为这个评价十分精准。所谓中华学术正脉，就是未被西方观念和概念所规范的中华传统学术。正是在对中华学术的坚守中，姚先生成就了他的百年辉煌人生。

姚奠中先生是如何守护这个中华学术正脉的呢？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

一、秉持“修己治人”的治学理念

早在20世纪40年代，姚奠中先生就精辟地概括中国学术说：“中国之所重，惟在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亦即‘修己治人’之道也。虽间有偏重，而大较则不出此范围。道家然，儒家亦然，其他各家亦无不然。而西人于此等问题，则远不如中国之博大精深也。”（《姚奠中论文选集·论治诸子》）“修己”是要提升自己；“治人”是要用智于世。这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治学理念。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也说：“君子之学也，以美

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为人”则是“小人之学”，其目的是把学问作沽名钓誉之具，以著述为能事，夸博于世，邀取名利。“为己”则是“君子之学”，旨在“美身”，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与人生智慧，以求用于“化民易俗”的济世事业中。清儒李容在《与友人书》中曾说：“著述一事，大抵古圣贤不得已而后作，非以立名也。”又批评他的朋友说：“比见足下以其所著诸书，辄出以示人，人之服我者固多，而议我者亦复不少。其服我者，不过服我之闻见精博，能汇集而成书也。其议我者，直谓我躬行未懋，舍本趋末，欲速立名，适滋多事也。”意思是说专事著述，拿著作向人炫耀，是一条舍本趋末之路。

从20世纪西风始倡之日起，中国学术界就开始把这条“舍本趋末”之路合法化、合理化，到20世纪后期“趋末”之学变本加厉。大学校园里在纯粹以项目、成果论英雄的价值导向下，出现了延聘、缓聘、低聘、解聘等等的用人政策，使得很多学人——从博士生到教授，在生存竞争与利益驱动之下，变成了生产文章、著作的机器，失去了“健全人格”的概念，也失去了以健康、快乐、幸福为原则的人生目标。很多人已无暇考虑内在精神的提升或如何去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而是一心为著述、为论文、为博士文凭、为职称、为绩效工资、为虚荣奋斗。许多书不是去读，而是检索、查找，在电脑上搜索，根本谈不上“学而时习之”。读书的目的是要在其中获取信息，网罗写文章的材料，提高文章生产效率，快出成果，多出成果，而不是提升自身的修养。在生存压力下，有人焦虑、抑郁，甚至自杀；有人人格变态，沦为文窃；有人为争“高产”，而付出生命代价。

在这种潮流中，姚先生则始终坚持“君子之学”的原则，他曾为学生拟定十则教条，其中第一条就是“以正己为本”，而他自已则躬身行之，终身不倦。他并不是没有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但他知道，提高自身的素质与人格境界比著述更重要。因而不汲

汲于去做著述竞争，而是把读书、看报、自省当作每天的功课，以人格修养为第一要义。为此他也曾失去了本来可以获得的学术荣誉和地位，但他没有表示出一点儿遗憾来。最终他却获得了他人想获得而未能获得的崇高声望，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的标志，便是能为人所不能为。今略举数端以为明之：

时下学界时因经济而生纠纷，而姚先生则视金钱为济世之物，“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每邻人有丧或国家有难，他上礼、捐资，往往是山西大学最多的。生前他把百万存款捐给社会，成立了国学教育基金；把书画捐给山西大学，建立了艺术馆。他的四个子女也各拿出了一部分钱，来支持父亲的义行。这不仅反映了他自己修养所达到的境界，而且也反映了他由“正己”而确立的“以从义为怀”的家风。

时下高校教师多以著述为能事，而姚先生则始终定位自己是一位教师，育人始终被放在第一位。学生上门求教，从不拒绝；社会上的求学者，也络绎其门。对他教过的本科生，大多他都能呼出其名。在1978年为他平反、恢复教授名誉的大会上，学校的一位领导在念到他的名字时，特意做了介绍，说：“此人很有学问，是老师的老师，希望他能为国家多培养些人才。”所谓“老师的老师”，即对他学问的肯定，也说明了他不仅教学生，也在教老师。具以使自己成名的文章，对他来说反成了余事。临终前在医院的病床上，大夫问他是谁，做什么的，他用左手吃力地写了五个字：“姚奠中教师”。

时下知识群体每以张扬个性为美，稍有成就，便以大腕自居，恃才傲物，难以容人，有谁说自己水平不行，那便会终身成仇。姚先生则以仁人之心对待身边事物，允恭克让，从不给人难堪。有一年他负责职称评审，当他夸一位老学生材料不错时，一评委告他：“你这学生在背地里还骂你呢，你不值得为他说话。”姚先

生却出人意料地说：“政策又没有规定，说学生骂老师就不能评职称的呀。”他的宽容大度，让在场的人都感到吃惊。

时下学人重著述而轻修养，著述之外，兼诗、书、画、印者寥若晨星，而姚先生则把读书、治学、书法、绘画、篆刻等俱当作了人生修养的课程，将这几方面的知识和体验，融汇一体，熔铸成了他的人文素质。20世纪80年代，先生到柳州参加关于柳宗元的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参观了柳侯祠后，会议承办方准备了纸墨笔砚，希望学者们能留下墨宝。姚先生则即兴作诗，挥毫立就。其诗曰：“迁客何妨去柳州？好山好水足相酬。牛刀小试终堪慰，民到于今说柳侯。”不仅用词贴切，而且立意新颖，境界高远，笔力雄健，为在场者所叹服。

这就是他人生修养所达到的一种境界。他像一棵大树，或许如他自号所云，是一棵“老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没有经济实用价值。然而他巨大的绿荫，营造了一方文化生态，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化标志。无数旅途疲倦者，在这里休息、避日、解困，振作起了继续前进的精神。当这棵大树失去的时候，人们顿时会感到空虚，精神似乎失去了归依。有人觉得姚先生在山西无人不晓，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可在娘子关外，却知者不多。但要知道，一个人最了解他的就是自己周围的人。如果周围人对他的评价很高，这说明此人名不虚传。如果周围的人对他评价低，而在外名头却很大，这多半为江湖术士之类。我有一个比喻：火有两种，一种是虚火，一种是实火。虚火老远都能看见，像房屋失火，即属此类。这种火连红薯也烧不好，给周边人带来的只能是灾难。而实火，远处看不见，周边人却能感受到它带来的做饭烧水的实惠。姚先生就是这样的实火。

“治人”则是要“用世”，要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姚先生在给学生拟定的教条中，强调“以用世为归”，这里体现出的是一

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追根溯源，章太炎先生推崇的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就曾说过：“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明道”、“救世”，这体现的是一种胸怀，一种境界，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章太炎先生本名炳麟，字枚叔，之所以要叫太炎，就是出于对顾炎武先生崇敬的缘故。他说：“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太炎文录初编·癸卯狱中自记》）不难看出太炎先生那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来。作为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姚先生继承了章先生的这种传统，他在讲台上给学生说：“现在的大学分科，历史系讲授的是世界史、中国史，把历史分成了两半；哲学系主要讲授的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变成了附庸。只有中文系是以‘中’字打头的，因此承传中国文化的使命就落在了中文系的头上。”从顾炎武，到章太炎先生，再到姚先生，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脉相传的精神。这种使命，姚先生始终坚持着，坚守着，从而影响了他的学术价值趋向。他是在这种理念之下做学问的，因而在他早期的论文中，便频繁提到“民族之精神”、“固有文化”的问题，频繁提到中国学术特色的问题。而在此后的教学实践中，也无时不坚持此理念。他无论早年办蓟汉国学讲习班，还是晚年设立国学教育基金，其志无不在于中华文脉之承传。此与时下唯名利是务者，其精神境界之高低相去何啻天壤！

二、坚守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径

如果说“学以正己”、“学以用世”，这是治学的理念，那么坚守传统学术的路径，则是一个治学方法问题。姚先生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有两点：第一，坚持文史哲不分，反对学科分割过细。第二，坚持秉本执要，反对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

“坚持文史哲不分，反对学科分割过细”，这是针对当下所谓科学的教育与学术思想而做出的抉择。自从西方学术输入中国之后，“科学”思想便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建立分科的知识体系，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主要走向。这种分科的知识体系，非常有利于技术层面上的单项突破，也有利于问题深入，如终身研究诸子，就可把诸子中许多细微的往往根本不被人所注意的问题拿出来讨论，专著也可因此一本接一本地产出。也正因如此，科学思想与分科的实践，创造了现代学术的辉煌。但由此推进的结果，使得学科越分越细，越分越多。一个学科之中又分开了若干个方向。因此在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很多专业性很强的研究机构和研究方向，如“中文”学科里，一个古代文学，还要分开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几个研究方向，搞“先秦文学”的不涉足于“唐宋文学”，搞“唐宋文学”的不过问小说戏剧。在一个语言学科中，也要分开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而现代汉语中又要分开语法、修辞、方言、语言学概论等不同方向。历史、哲学等各个学科，情况都大致相同。最使人感到不安的是，在这种学科分割中，学科之间出现了高大的隔离墙。几乎每一个学科的人，都守护着自己的领地，如同封建诸侯一般。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学术圈子”。属“圈子”中的成果，则要么写书评以捧之，要么摘引以宣之。若非“圈子”中人进入自己的领地，则要么以笔伐之，要么冷漠视之。此种风气愈演愈烈，以致学术失去了正常的评价判断。

在这种“分科知识体系”被强化的背景下，学校专业设置、教师职称评定、社科成果评奖、人才支持计划等等工作，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与评价标准。由此而形成了一条条著作技术生产线，“专家”丛出，“大家”消失。一个很显著的事实：在 20 世纪早期，由于有中国传统学术的早期教育和旧学功底，涌现出了如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郭沫若等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而 20

世纪后半期至今，在分科教育的培养模式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文史哲领域却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大师来。同时以此为背景的评价制度，使一些本可成为“大家”的人才，在所谓“没有稳定的研究方向”、“杂而不专”的非议中，被排出支持计划之列。一些狭小而偏的问题被发掘，且以创新与填补空白的名义被宣传、奖励。而一些重大的综合性的问题，却无人问津。这种种问题引起了有志之士的担忧。

在这种潮流中，姚奠中先生则始终坚持着“以小学为基础，文史哲不分”的治学传统。他认为：当下分科的学术格局，虽然有利于具体问题的深入，但并不利于问题的根本性解决。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具体分析”固然重要，但更应该注意“整体把握”。整体把握下的具体分析，才有可能把问题看透彻。站在地球上看太阳，认为太阳围着地球转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如果站在宇宙间看，则发现正好相反。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但要整体把握，就必须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拆除学科之间的隔离墙。庄子在《天下篇》中提出过两个概念，一个是“道术”，一个是“方术”。所谓“道术”，就是对事物做全面性、整体性把握的学问，是对道的全面体认，所把握的是基本精神。而“方术”则是拘于一方的学问，它所得到的只是事物的局部，根本不能把握大道的基础精神。“方术”是由“道术”分裂而形成的。方术之士各执一端，就像是耳目口鼻，虽都有各自的功能，却不能相通。鼻子能嗅到味，却不能嗅到颜色，嘴能尝出酸甜，却不能尝出声音。把事物割裂开来分类认识，自然难以获得对事物本质的真正把握。现在这种过细的学科分类，其实就是庄子所说的“方术”，学者也变成了庄子所谓的“一曲之士”。此虽然有利于一得之见，但对学术整体的发展十分不利。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姚先生在指导研究生时，一直强调要从小学入手，由小学入经学，通文史，而后归于诸子。他认为，只

要把这个基础打扎实，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要文而得文，要史而得史。但要走他这条路很艰难，因为这要有很大的知识储备。如同用铁制器，要打造一根针很容易，有一点铁就够了，而要打造一个锤子，显然几百根针的铁也不够。而且针可以扎得很深，锤子却不行，没有深度。这在一般人看来，就是锤子不如针了。正是由于针“投入少，产出多”，所以学术界人们都争着去做“针”，在自己专业的一亩三分地上，做上几年，就成专家了，立起一面旗帜，建立一个高地，自己便称起老大来。但要知道，锤子砸下去产生的震撼力，是一千根一万根针也做不到的。而且一个锤子的铁，既可以打造很多针，也可以造茶杯、茶壶、菜刀等等的许多工具。但若只是一根针，那就只能是针，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现在大学校园里培养人才，大多是在制造针，而不是制造锤子。姚先生也深明打好“国学”根基之艰难，因此对于学生，他根据不同情况，因材施教。对年龄偏小的，则要求从小学入手。而有些学生对小学没有兴趣，或者年龄偏大，他则强调文学史必须通，历史必须要读，这则是硬性要求，而且还要布置这方面的作业，不允许学生只抱住唐或宋一小段文学而不及其他。他自己则是经史子集，不曾偏废。因而读了《姚奠中讲习文集》，很难说出他搞的是历史还是文学，而书画界的专家，又把他认作是泰斗。这就是文史哲融通的结果。

为了打破“分科知识体系”培养人才的局限，姚先生几十年来，一直想在太炎先生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建立一套新的教学模式，并落实于教育实践中。有人曾做过研究，民国时期，章太炎先生一人培养的著名文史学者，比北大、清华加起来都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清华、北大采用的是西方的分科教育模式，而章太炎先生则是传统的“以小学为基础，文史哲不分”的教学模式。故而姚先生相信，要想培养大家，就需要坚持走“以小学为基础，文史哲不分”的路。但是因受到现行教

育观念与教育体制的制约，始终未能实现。这成了他晚年的一大遗憾。2007年，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时，姚先生信心百倍，以为他的教育理念有望得以实践了。当得知国学院不能招收本科生时，他非常沮丧，但也很无奈。在给章念驰先生的信中说：“我教书六七十年，局于‘功令’之内，很难有所作为。不愿随时俯仰，却终于无可奈何。”

其次是“坚持秉本执要，反对以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百年来，中国人从社会界到学术界，都不约而同地进行着一项工作，即以西方人的概念规范中国人的行为。在学术界最先是胡适、冯友兰，他们把西方的概念拿来，大谈方法论、本体论、宇宙论等，把中国哲学割裂成西方哲学的模式。许多人只感到这样的观点很新，而却不考虑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国学术的精神在失血中逐渐消亡。到20世纪后期，各个领域几乎全部为西方概念所占有。用支解中国学术的方式，迎合西方的理论，几乎成为一种时髦。在许多学者的笔下，经常是一串西方人的名字和西方人的语言，而自己却只能跟着西方人说，有学者称此为“失语症”。甚至出现一种很让人悲丧的情况：一旦中国的实际不能满足西来概念要求的条件，便会有人感到羞惭，以为“技不如人”。而一旦中国的实际越出了西来概念的范围，便不惜削足适履。一个显著的例子：“国学”作为一个承传中国文化知识体系与价值系统的学术载体，至今在大学校园落不了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符合现行的学科分科规则。然而却很少有人思虑：在现行的学科专业中，还没有哪个学科可以替代国学的。不少高校成立了国学院，将文史哲三个专业的力量组织在一起，这是当下为救学科分割之弊采取的措施。但是许多国学院，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文史哲三股力量仍在“自治”，并不能真正地融合。原因在于分裂已久，如同水泥，已各自凝固。所以这种合起来的文史哲，与文史哲不分还是两个概念。

对于这种研究方式，姚先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所撰写的《论治诸子》中就开始了批评。他批评胡适、冯友兰说：像他们这样做学问，把中国的学术按西方概念来划分，把要害的东西都丢掉了。他们所说的方法论、本体论、宇宙论等问题，中国学术中虽然也有，但不是中国学术的本质，而是皮毛！比如先秦诸子，其所论核心问题就是“修己治人”，而并非所谓的宇宙论之类。基于此种认识，姚先生始终坚持用传统方法研究传统学术，对西方的研究方式与概念只做参考，而不为其所左右。对问题不是从理论或概念出发，而是始终面对事物本身。不做长篇大论，而是短小而精，直奔主题，一针见血。不求建构什么大的理论和体系，而是解决阅读中存在的问题，辨明是非，求文本之意义获得澄明。如他的《书注与读书法》《论治诸子》《〈庄子〉内篇间绎》《〈礼运〉大同辨》诸文以及读书札记，无一空论，无一不是为解决读者困惑而发的，实践的意义非常突出。

当下也有不少学者发现中国学术被西方概念绑架而导致的传统断裂的危机，于是在不同的研究方向上不约而同地发出了“现代转型”的呼声。这种提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站在全人类利益的高度来看待文化的。一种文化对人类的未来有好处，我们就要接受它、推广它，而不是站在某种文化的立场上，来为它的生存着想。如果把自己定位为儒家，就要谈儒家文化怎样转型，要为儒家的继续生存、发展考虑。有人谈道教文化的现代转型，那显然又是站在道教信徒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谈古代文化的现代转型，那显然是站在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的立场说话的。但这不利于异质文化交流、融合，也不利于正确认识、分析民族传统文化。我们现在要打破民族本位主义，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来考虑问题。要考虑怎样才能把各种文化中最精髓的内容提取出来，为人类未来发展服务。

中国传统学术是在不断汲取新的文化营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它是人类积累了五千年的智慧之果，这种文化有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气概，它面对的是全天下，而不是某个个人、民族和国家；追求的是万世太平，而不是眼下的利益。这种文化蕴含的智慧和价值体系，只有通过中国传统学术的路径才能发现、汲取，如果用西方的一套观念和概念来分析它、归纳它，它的精髓便会丧失。同时，也只有打破文化本位主义，才能对这种文化做出正确的认识和估价。

三、践履“回真向俗”的学术路线

“坚守传统学术路径”是治学的方法，而“回真向俗”则是治学的方向、路线选择。姚先生曾书录章太炎先生《蓟汉微言》中“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一节，悬于书屋，这里反映了他对太炎先生的怀念，同时也表达着他的学术思想与志趣。对太炎先生提出的“回真向俗”，学人有不同理解。而姚先生的“回真向俗”，则切实地表现在他“以博学为知，以用世为归”的追求中。“真”是对知识的追求，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博学”即体现着对“真”的把握。“俗”则是对现实的关注，对当下问题的思考，“用世”即要将知识、学问变成一种眼光和智慧，来分析处理现实中遇到的难题。这就是“回真向俗”。《礼记·学记》中提到君子要“化民易俗”的问题，此中蕴有提高全民素质的指导思想。“向俗”也意味着要“化民成俗”，使社会更多民众得到良好的知识培养。今人每言“深入浅出”，其实这也是“回真向俗”的一种表现形式，“深入”追求的是“真”，“浅出”面向的是“俗”。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只有得“真”，才能化“俗”。

“回真向俗”的学术路线选择，是一个学者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体现。现代学术界，由于受到西方价值观与当下学术价值体系的左右，大批学者出于功利目的，一味追求理论创新、

填补空白之类的学术荣誉，“弃俗从真”。一些面对社会大众的读物，在不少高校不仅不算学术成果，甚至不计“工分”。这样，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研究的问题懂的人越少，就表示水平越高；多数人关注的问题，反而被认作缺少学术含量。把研究变成了名利经营，无心向民众说话。一些水平高的学者，则视学术研究为高级娱乐活动，只要学术圈子里有几个人说好，自己便洋洋得意起来。

姚先生则不然，他不以解决学术难题为高，而以解决眼下所需要的问题为要。他觉得自己是教书的，首先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应该是教学问题。因而为了教学之需，他编写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先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等讲义，虽未编讲义但曾讲授过的课目有“说文研究”“庄子研究”“中国戏曲史”“文艺学”“中国文论”“汉书艺文志”“中国文学史十讲”等，还多次应中学教师之需做中学语文教学的约题讲座。当时在中文系，若有哪门课没有人上了，只要领导说一声，或学生有要求，自己便义不容辞。像如此繁多的教学课目，又涉及了文史哲三个不同的学科，一般学者一是难以胜任，二是很少愿意去做。尽管这些讲义大多浅显、通俗，没有多少学术性可言，但要言不烦的“秉本”之论，却体现了他的学术眼光和功力。

其次是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姚先生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讲习文集”，就很能说明问题。姚先生解决的是哪类问题？又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呢？举例来说，柳宗元的《江雪》是普及读物及中小学教材中都曾出现的篇目。元、明以降很多人分析这首诗，都认为这首诗的主题是写渔翁的。有人说渔翁是高士，有人说是隐士，还有人说是穷苦百姓。而姚先生的分析是：诗的题目是“江雪”，说明它重在写雪，写寒冷的环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漫漫天地间看不到一个人影，自己就在那个寒冷的

环境下生活，表现出了冷酷的环境对作者心灵造成的压力。所以这首诗的重点不是写渔翁，而是通过渔翁体现出了作者在严酷的环境中坚持奋斗的精神。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大中学校的教材中出现的，许多人认为是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真挚爱情的，姚先生则抓的是标题的“恨”字，恨什么，谁在恨。想一想，大难临头，唐明皇为了保全自己，让杨贵妃去送死。杨贵妃难道不恨吗？《长恨歌》里写杨贵妃没有死，她不愿意见唐明皇，因为她恨死他了。再如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这也是一首妇孺皆知的诗。但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人们并不甚清楚。李汉超解释说：“夜入吴”的是诗人和他的朋友。社科院编的《唐诗选》也说：诗是写寒雨之夜，诗人陪客进入吴地。但是既然是送客“夜入吴”，为何又说是“平明送客”，这不相互矛盾吗？姚先生则抓住诗的标题，认定“送客”地点在“芙蓉楼”，又抓住“平明送客”四字，认定“送客”的时间是“平明”，主语是诗人。由此而认定，“入吴”的不可能是诗人，而是“雨”。像这样的问题，在大学者看来太小了，不值得思考，但这却是千百万人都熟知的古典名篇，其解释的错误称之“误人子弟”，亦不为过，故不可不认真对待。这种文章看起来容易，实则颇显功力，也见境界。因为要摆脱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制约，思考社会需求，调整研究方向，需要有一种超越世俗名利的精神。只有为大众着想，为人类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精神的承传着想，才有可能做到。同时还需要有一种水平，能在别人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在别人以为有问题的地方看到不存在问题，这都需要有功力。因此姚先生“回真向俗”的学术思想，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学术观点，更重要的是学术水平与胸襟、胆量、境界。

人文学科研究的目的，是建造人类精神文明的灯塔，让人类的航母在灯塔的指引下，沿着健康、快乐、幸福的航线平稳前行。姚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实践证明，坚守中国传统学术正脉，有利于